

第一编

侨乡变迁研究

乡村都市化进程中的侨乡变迁 ——以凤凰村和唐家村为例

周大鸣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题记 今天侨乡的村民 是否还记得当年先辈们背井离乡披荆斩棘的辛酸和血泪！是否能体会到今天同样背井离乡到侨乡奋斗、挣扎的外出务工者的心情！

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以凤凰村和唐家村为例对乡村都市化进程中的侨乡社会经济发展现状进行剖析，提出社会转型期的建议和对策。

一、当前侨乡研究的现状和两个村落的基本情况

通过中国学术期刊网（<http://www.chinajournal.net.cn>）检索 笔者发现 1994 年到现在关于侨乡研究的文章一共有七十多篇，其中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占一半左右，其他大多是宣传、介绍性文章。学术论文一小部分是史学取向，其他着眼于方方面面的社会文化变迁和经济发展。基于人类学田野调查上的研究现在也越来越被研究者所采用，相应的学术会议如 1999 年的中国侨乡社会经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等也说明了侨乡研究已经日益受到重视。

本人在近年的研究中 认为侨乡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像粤中的五邑、福建的安海等著名的侨乡，侨胞数与本土居民相比占

到 60% 以上 如五邑之一的恩平 本土居民 40 多万 华侨和港澳同胞则有 30 多万。这一类侨乡受到华侨和外来文化的影响最大，在经济、社会、风俗、精神文化等多方面都形成了独特的社会风貌，很多地方初步实现了村落的“集镇化”“集镇的”“市镇化”“县城和小城市的”“大都市化”“大中城市的”“国际化”“都市化的程度最高。第二类侨乡侨胞数与本土居民相比在 30% 到 60% 之间 像凤凰村和唐家村就属于这一类型。这类侨乡表现出一种多元文化融合的现状，从乡村都市化的角度讲，正处在转型的关键时期，从决策的层面讲，研究价值最大。相对而言，凤凰村的都市化之路起步要晚一些，路可能要更长一点。第三类侨乡侨胞数与本土居民相比在 30% 以下，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传统性较为明显，正处于乡村都市化的萌芽时期。

凤凰村位于潮州市归湖镇，离潮州城 15 公里 村西面紧临归湖镇政府所在地——葫芦墟，归赤公路从村前通过。美国社会人类学家 D. H. Kulp 曾在 1918 年—1919 年对该村进行调查，于 1925 年出版了《华南农村生活》。该书详细描述了凤凰村的经济、家庭、教育、宗教以及社区组织的情况。1994 年 笔者寻找到凤凰村并于年底进行了第二次追踪调查。

凤凰村是一个以戴姓为主的行政村，戴氏始祖于明代自江西迁入，聚族而居，逐渐成为当地之望族。目前包括凤溪、墩角、岭边、菜园尾等四个自然村 共有 299 户 1142 人。有耕地 305 亩 其中水田 200 亩、菜地 105 亩 另有山地 500 亩。1978 年分田到户时人均只有 0.26 亩土地。由于人多地少，按 Kulp 书中的记载，那时除了从事农业以外，大部分人是从从事非农业。凤凰村人有出洋经商和打工的传统，主要是下南洋，即现在的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港澳和台湾也有不少。所以今天大多家庭都有海外关系，侨汇一直是村民们的重要收入来源。

唐家村枕山面海，位于珠海市东北部唐家镇，镇政府驻地即在

本村。唐家村北上广州 130 公里 距澳门 18 公里 京珠高速公路穿镇而过。村民以唐、梁两姓为主 还有少量的程、冯、江、文、杨姓。曾孕育出洋务运动时期著名的实业家唐廷枢、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总理唐绍仪等近代名人。

“靠海吃海”明清两代的‘海禁’政策和海盗的滋扰 使当地靠单一农业生产的谋生道路越走越窄。民国二十三年本的《子英房谱》(唐氏)记载 早在康熙、乾隆时期 零星的出洋就开始出现。1855 年重修的《子英房谱》中 一共记载有 6 人在康熙、乾隆时期出洋贸易。这只是当时唐家出洋村民中很少的一部分。到了鸦片战争以后,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艰辛,大规模的移民潮开始出现。唐家先后有过几次出洋热潮:

第一次移民潮出现在 19 世纪 40 年代末。1848 年美国加州发现了金矿,大批唐家村人踏上了淘金大军的征途。岁贡生唐步瀛写了一篇《金山埠记》 开篇就谈到华侨之所以到海外谋生 是为了寻找更好的希望。

第二次移民潮出现在 1865 年 北美洲修筑太平洋铁路 大批唐家人再次被运往美国做苦役。

自此以后 很多唐家第一代移民在美国站住了脚跟 开始把家人亲戚带出国门。1882 年美国的排华法案通过后,很多华侨被迫往返于故乡与美洲之间。

第三次是由在美国的亲属 继 1906 年加州大地震及大火灾之后,趁政府档案尽失而无法核对的机会把家乡的亲属都填表入户进入美国。

以上这三次移民的直系亲属或后裔较少留在唐家,移民大部分集中在美国三藩市,今天还有会馆。现在唐家人的亲属大多集中在香港、澳门 这部分移民主要是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过去的。

唐家村目前共有 800 多户 3000 多人 土地全部收归珠海市政府所有,村民的职业正在发生急剧的分化。除了少量渔民外,已经

不存在农业生产。有一部分村民由农民向市民适应得较好，找到了较好的职业或出路，而另外一些处在不断徘徊之中。

凤凰村和唐家村都属于第二类型的侨乡，下面将从更具体的方面谈变迁的现状。

二、梯级迁移——既是劳务输出地又是输入地

侨乡由于有一定的侨汇注入，相对来讲，经济基础要比省内的平均水平好一点。改革开放以后，本地一部分劳动力仍然外出务工，一部分劳动力转移到其他非农产业，这样吸引了外来人口填补留下的空白；或者本地的非农产业吸引不了本地人，外来人成为这类企业的工人。这种梯级迁移在珠江三角洲边沿地区非常普遍，形成了独特的社会风貌。

1978年后，劳动力可以自由支配。凤凰村和唐家村的村民开始走多种经营的路子，从事非农行业的人越来越多。80年代到90年代初凤凰村的村民主要有五个流向包括到潮州、汕头、深圳等地打工、跑运输业、经商、办厂和从事家庭副业。由于唐家村距澳门很近，70年代末80年代初还有陆陆续续到澳门工作的村民。1979年5月唐家村乡亲梁文根先生从香港返乡投资800万港元，建成珠海市针织印染制衣厂，另外在唐家镇设立一个分厂，用短短3个月时间，培训了唐家地区男女青年400多人成为首批制衣工人。珠海经济特区成立以后，部分村民开始到市中心香洲区打工，有点类似欧美大城市的情况，员工每天从郊外赶到市中心上班，这一部分人从农民到市民的适应比较成功。除了在工厂、企业工作以外唐家人还从事一些商业活动如开商店、餐馆、茶楼、搞运输业。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和刚中学毕业的青年有一部分没有找到工作。

进入90年代，凤凰村办起了一些加工厂，主要是表带厂。这

些厂都是办在村上老房子里，通风、采光等工作条件都不太好。这与珠江三角洲 80 年代发展之初很类似。由于村里已没有多余劳动力，另一方面本村的工厂由于条件差工资低也吸引不了本村人，所以工厂里的工人，都是来自江西、湖南和四川。一家厂约有 20~50 个工人，以女工为多。工资按件计算，一个熟练工人最多 300~400 元一个月。这些厂一般是港商投资，工厂的管理人员都是本地人。这些管理人员大都有外出务工的经历。所以当我们说这些工人太辛苦时他们说：“我们也是这样干过来的。”

在唐家调查，印象更深。差不多一半的房子是外来人租住，而且来自五湖四海。走进村头巷尾，到处是狗，细问才知狗是守家防盗必不可少的动物。很多村民把治安的不好归结为外来人太多太杂的原因。80 年代中期就有部分梅州人到唐家来种田、种菜，笔者调查到一个在唐家从小学一直读到初中毕业的梅州人，我跟他你说你算“唐家土长梅州人”。后来唐家办起了一些企业本地青壮年大部分已经转移所以外来工越来越多渐渐地来唐家经商、打零工的外来人也多起来。村民还跟我说：“到村头榕树下一看就知道了每天很多人在等零工干。”

这就是梯级移民的现象：一方面本村劳动力大量外出，另一方面又吸收了大量的外来工。输出者与输入者之间具有惊人的相似。在侨乡的侨胞因为各种限制加入外国籍之前，就像现在的外来工因为户口的限制永远都不能成为本地人一样，存在着钟摆式的流动。直到加入外国籍，才摆脱像钟摆一样流动的命运。

三、变迁中的社会文化

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的日趋现代化。这是最明显的现象。通电、通自来水、通公路、通电话等“四通”在两个村都早已实现。很多人家中盖起了新房。摩托车变成了常用交

通工具，手机也逐渐为人们所使用。深层的制度和精神文明方面，有以下几点变化：

1. 家庭结构发生变化，家庭规模日趋小型，核心家庭占主导地位。年轻人一般不愿意和老人住在一起，部分老人也愿意与孩子分开住。有几个孩子的老人，一般随时都可以到孩子家看看，有的也经常帮着带孙子。这种现象在唐家表现得更为明显。由于唐家部分村民 70 年代末才到香港和澳门去，单纯从户口本上看，有部分“残缺家庭”如丈夫和小孩的户口迁到了澳门，只留下妻子的户口在村里。

2. 人际关系和邻里关系。首先是家庭人际关系，出现了“候鸟型”家庭，有的是丈夫或妻子一方在外地工作，过年过节才回家团聚。有的举家外出，但过年回来与父母或亲友团聚。男女平等意识较强。其次是村民间的人际关系，由于人口流动加大，加之部分村民搬到镇上或村外居住，见面的机会减少，不同层次和年龄的人交往更少。邻里关系正在逐步疏远。地缘、血缘关系慢慢被业缘关系所取代。凤凰村由于不是镇政府所在地，相对来讲，变化小一点。现在还加了一个本地人与外地人关系的问题。大概是侨乡的关系，本地人与外地人互不侵犯，互不干扰，交往较少，但歧视也不多见。

3. 村落权威与社会组织。老人的地位逐渐削弱，老年人有老年人的娱乐场所和圈子，老人也不再管“闲事”。唐家还有老人活动中心，很多老人去中心聊天。社会组织由单一化向多元化发展，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交错并行。村委会与村民间的互动比以前少了。年轻人职业的转化和外出的增多影响到对活动的参与。

4. 精神文化方面，多元文化并存杂处，用五彩斑斓形容恰如其分。“文革”中破“四旧”破掉的那些习俗和信仰现在又重新复。两个村的古庙都进行了重修。但唐家的宗族复兴相对于宗教复兴要弱很多，也比不上凤凰村的宗族复兴，可能与政府对三圣庙

的重修较重视、几个大祠堂先后用作工厂厂址后来收归集体有关。目前，唐家村的文化建设搞得很不错，文化设施较全，这里面有历史传统和华侨的一份功劳。唐绍仪等人留下了很多文化遗产，华侨也多次捐资用于文化建设事业。

5. 从农业到非农业的转变，心理准备和知识储备都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非农行业没有农业稳定，工作随时可以更换，有的老板随时可以炒职员的鱿鱼，很多人觉得心里不踏实，言谈中表露出无奈和抱怨的情绪。现在就业压力增大，竞争激烈，不稳定心态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另一方面对社会也没有很清楚的认识。

四、问题和对策

综观两村，都面临经济发展和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和文化都表现出了转型期的特征。单从村民对调查的态度就可以体会得到。我们在调查中被问得最多的是“你们调查的目的是什么？有什么好处？”

劳动力总量过剩无疑影响到侨乡的经济发展。唐家村亦有部分没找到合适工作岗位而在家赋闲的青年人，整个经济大环境的原因使竞争日益明显，当地村民反复跟我讲现在找工很艰难，能有个单位就不错了。唐家调查，怨声载道的大部分是 50 岁至 65 岁的村民。他们的心情可以理解：想进工厂或打工，比不过年轻人；想像凤凰村的同龄人一样种地，又没地了（内地很多都是中老年人和妇女在家种地 青年男女外出务工）想休闲享老 又没有大城市人所拥有的条件和经济实力。只好三五成群凑在一起闲聊。聊多了，自然把不满发泄到政府征地这一件事上来。当地很多年轻人与长辈有“代沟”大概除了对问题的看法和意见不同之外 更多的是心态的不同。

以前侨乡的发展受外驱力的影响较多 包括外出务工、吸引侨

胞和外商投资、外来劳动力的输入等等，发展到今天，遇到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内驱力不足等一系列问题。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优势已经不再明显，怎样转型成为侨乡再一次飞跃的关键。

1. 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今天的侨乡恐怕很难单纯从“侨”字上下功夫了。对于凤凰村来说，要利用侨资这一优势，招商引资的前期投入必不可少，包括一系列配套的公共设施。只有既讲乡情，又晓之以利，才能真正引来金凤凰。至于经济发展的内驱力，关键在于技术的创新和村民本身知识水平的提高。历史上唐家村曾经有过几次绝好的发展机遇，最终均功败垂成，令人扼腕。上个世纪末终于抓住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创办大学城，吸引中山大学和一些名牌大学在此建立校区，创立科技孵化园。

2. 政府职能的转化、社会组织的合理化。从唐家村来看，村委会的管理模式已经显得力不从心，凤凰村的情况还可以。唐家村社区服务中心的辅助形式很好，值得推广和借鉴。外来人口和出租屋的管理还有待加强，建议更多地关注外来人口。

3. 传统的创新和利用。现代化、都市化不能脱离传统进行，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很重要。这就需要政府对村民进行必要的正确引导，主导变迁的方向。比如祠堂和庙宇，既可发挥原有的功能，也可以使它的功能不断朝集体活动场所的方向转化。宗族也可以向社区的功能方向转化。

4. 公共设施和管理。两个村的公共设施离乡村都市化的要求还有一段距离，包括环卫、下水道、街道、道路等的建设。从调查中显示，侨胞更热衷于进行文化教育和公共设施的投资，可以进一步挖掘这方面的潜力。公共设施所需的资金由多方筹集，大家共同维护管理。

参考文献：

1. 唐有淦：《从洋行买办到民族资本家》 珠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1995。
2. 唐有淦：《唐家村村史》 唐家镇人民政府编印，1997 年。
3. 唐有淦：《唐家地区华侨史话》，珠海市香洲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1992 年。
4. 周大鸣：《现代都市人类学》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 年。
5. 周大鸣：《中国乡村都市化》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年。
6. 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华侨史论文集》1—4 集。

从一个村庄看侨乡台山社会变迁

黄淑娣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广东台山县 1992 年 5 月改市 被誉为全国“第一侨乡”。台山于 19 世纪末形成侨乡至今一百多年，经历了沧桑巨变。本文拟联系笔者调查的一个侨乡村庄台山附城镇南隆村所作的调查，并参考台山侨务办公室 1992 年编的《台山县华侨志》叙述台山侨乡社会若干方面的变迁。

—

台山市附城镇雁沙南隆村，一个有上百所房子的村庄，20 世纪 90 年代的常住人口只有 33 户，140 多人。侨居国外的人口数倍于此，主要在美国、加拿大、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村中耕地少，人们从 19 世纪末就出洋谋生。这个小村庄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变化，仿佛是台山侨乡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

台山市现有人口 110 万余人。海外同胞（含港、澳、台同胞）129 万余人。旅外人口多于居乡人口。旅外人口分布于全世界的 91 个国家和地区，以北美洲为主。美国有 502,236 人，加拿大有 175,503 人，欧洲有 20,123 人，东南亚有 10,638 人（其中马来西亚占一半），澳大利亚有 17,632 人。香港同胞有 356,758 人，澳门有 66,098 人，台湾有 6367 人，其他国家和地区有 50,877 人。全市侨眷、侨属及港澳台亲属 90,832 户，803,953 人，相当于全市居

乡人口的 78%。^①

台山旧称新宁,1914年改用今名。地处珠江三角洲的西南部,面临南海,海岸线长587公里,沿海岛屿众多,很早就开始对外交往。嘉庆《新宁县志》卷四载:“菩提树,广海卫城东门外灵湖寺六祖堂前,大可数围,高六七丈。相传梁天监元年有智药三藏自西竺航海而来,手植于此”。可知早在公元502年便有西竺僧人来到广海。宋朱彧《萍洲可谈》载:“广州自小海至潯洲七百里,潯洲有望舶巡检司”。商船放洋后归来,有寨兵防护至广州。潯洲即广海,这里是广州对外贸易必经之道,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明代台山已有人集体移居东南亚各国。南部沿海有出洋的便利条件,早期出洋谋生的大都是南部沿海地区的人。有文字为据者,18世纪有广海山背村陈学进,1774年去南洋,端芬梅耀萱,1786年去马来亚;19世纪初,1815年广海山背村陈利宗去南洋,1819年端芬那泰和乐村曹亚志去新加坡,1821年上川甘泽农乘帆船往美洲^②。19世纪下半叶出洋谋生的愈益增多。

台山形成成为侨乡有当时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历史的原因。台山境内丘陵地多,平原约占总面积的43%。清朝中叶经过百年开垦之后,易于开辟的地开完了,至嘉庆年间已出现地少人多的局面。历史上自然灾害多,旱涝灾不断,盐潮长年为患。仅19世纪下半叶就有水、旱、风、地震、瘟疫、饥荒三十余次。贫苦农民生活难于维持,不得不冒险向海外寻求出路。连年战祸,“海禁”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咸丰四年至同治六年(1854—1867年),土客械斗达14年之久,台山、开平、恩平三县边区土客斗争十分惨烈,仅台山一地上客双方被杀的在23,000人以上,因疫病死亡的两万多人。

① 《居正月报》复刊第39期,第10页,台山居正月报,1999年12月。

② 陈翰笙:《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七辑,16、15、3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③ 台山侨务办公室:《台山县华侨志》,9、10页,1992年。

年轻力壮的纷纷往外邦谋生，械斗双方把俘虏运去港澳当“猪仔”转卖给殖民者的经纪人 加上自己卖身当“猪仔”的约有两三万人。鸦片战争后 清廷与英国订立了屈辱的《南京条约》 允许外国人在内地设馆招工。1843 年美国发现金矿，1850 年澳大利亚发现金矿 他们的经纪人在广州、四邑（台山、新会、开平、恩平）招募劳工去开发 散发的传单上说什么“彼处有优厚工资 大量上等房舍、食物与衣着” 诱骗“猪仔”上钩。

19 世纪美洲西部大开发，美国扩建中央太平洋铁路，招募去参加筑路的华工有四五万人，多数是从四邑去的^①。在许多工程艰巨危险的路段，都由华工修筑，大量华工葬身悬崖，据老华侨回忆，参加筑路的数万华工中，牺牲者不下万人。1880 年—1884 年有 17,000 名华工参加修筑加拿大的太平洋铁路，600 多名华工在筑路中死亡。1877 年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华工以极其低廉的工资，将辽阔的低洼地开辟成 500 多万英亩的良田。在华人开发美洲西部的血泪史中，也包含了台山华侨的苦难。19 世纪中叶，台山华工在开发美国和澳大利亚金矿、马来亚的锡矿和夏威夷的农业中，都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台山人称美国西部为金山，澳洲成为新金山之后，三藩市便被称为旧金山。

雁沙南隆村是在 19 世纪中叶从南坑迁出建村的。老村前几辈人出洋当劳工的故事，如今人们已经记不清了。建新村后，19 世纪的后 20 年至 20 世纪初，年轻人相继漂洋过海做工。大多数当卷烟工、洗衣工、厨工、伐木工等。西人视洗衣为下贱行业 只有华人去做，早期洗衣靠手工操作，一块搓衣板、一个熨斗就可以开工，有了积蓄才能有个小小的工作间，再发展就是开个洗衣馆。村人有不少当烫衣工 烫衣工一天干十几个小时 环境差 温度高 没有固定的休息吃饭时间，随身带着饭团待有空隙时吃上一口。有

陈翰笙：《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七辑，16、15、35 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

一位卷烟工卷了多年雪茄烟，一辈子落下哮喘病。厨工也是台山华侨最普遍的职业，村人做厨工的也多，要有烧腊、烹饪手艺，熬够了年头，攒一笔钱开一间餐馆是最大的愿望。

笔者在童年时代就常常听到老归侨讲述木屋囚的真实故事。华工乘船去美国，要走上一个来月，船泊码头，转泊孤岛上候审所，住在木屋中如坐监牢，往往有几百中国人住在一起，水土不服，患病者多。人们等待审问口供，几经折磨才侥幸获通过。老华工发出了“白种强权，黄魂受惨”的悲叹。1910年《新宁杂志》曾有文章指出这种审问既繁琐亦荒谬。这种候审所在许多港口都有，旧金山港天使岛候审所从1901年至1940年关闭为止，关押过十多万华侨。笔者在纽约访问时乘船游览，就看到过关押候审华侨的孤岛。它们是种族歧视的见证。

二

20世纪上半叶，南隆村出洋谋生的人增多，人们的职业也有所变化，多从事饮食业、洗衣业、杂货业等，有积蓄的开餐馆，从事商业。南隆村是黄姓单姓村，由老村迁出的成员属于同一宗族的不同房支。建村后有的家族如家乐祖人兴财旺，成为村中最富裕的家族，购置了大量族田，族中子弟读书、出洋、经商的机会较多。黄文广在美国纽约州布法罗市开设了上海楼餐馆，带了两个侄子去做工。文广精明能干，通英文，广交游。他每数年一次回乡省亲，体察形势，认为应在香港设商号，建立族人向外发展的“桥头堡”，以便子侄们出外发展。香港是台山人出洋或还乡必经之地，是家乡与海外联系的纽带。文广在国外见过世面，长了见识，有一些商业眼光。由文广牵线，族人出资并与其他友人合股，先后在香港、新加坡、马来亚、印度尼西亚等地开设了几家药材行，生意兴隆，驰名东南亚。还在台山县城开设了银号，也曾兴盛一时。有了

桥头堡，族人出外做工便有了一条出路，以后族中不少人都曾在家乐祖子孙开设的商号任职。老一辈华侨成为商人、士绅后，有些人出资培养子侄读书，以便后继有人，也是为了本家族的发达兴旺。由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到中国宗族文化的传承。

宗族制度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台山的宗族制度一向比较发达。老华侨有很强的宗族观念，他们离乡背井找出路，最后要回到家乡落叶归根。只身在异乡，举步维艰，一次又一次的排华风潮禁止华人入境，一系列的歧视华侨的法令使华侨饱受欺凌。他们有困难往往寻求华侨社团组织的帮助。海外华侨社团，主要是同乡组织和宗亲组织。前者如 1822 年在新加坡成立的宁阳台山会馆是台山第一个社团组织。1854 年成立加州宁阳会馆，美国有台山宁阳总会馆统辖各埠的分馆。后来又称为台山会馆、台山同乡会。此外还有邑内的地区同乡会，有联县性的如四邑会馆等。宗亲组织是宗族性的，如黄氏宗亲会（江夏堂）、李氏公所（陇西堂）、梅氏公所等。华侨遇到困难时，自然地想到要找宗亲组织的帮助。南隆村属黄氏宗族，黄姓在台山是大姓，海外许多地方都有黄氏宗亲会，是十分活跃的宗亲团体，近年还成立了世界性的黄氏宗亲会。

南隆村的华侨，只有极少数人成为富商，绝大多数都是打工仔。他们在当地含辛茹苦，拼命干活，省吃俭用，积蓄了一笔钱便还乡成家，有钱的盖一所房子，很少置田产。金山伯回唐山，一般带回一些日用品和食物，如香皂、铝锅、罐头食品等。老侨工们长年累月只顾干活，没有任何文化娱乐活动，对大都市的生活习惯不熟悉。村人流传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说村里一位老侨工回唐山经过香港，上了一辆双层电车，不坐乘客的座位，而蹲在座位之外，问售票员这样可否减低票价。被描写成“乡巴佬”的老侨工的举动，叫人笑不出来，而是使人感受到旧社会华工生活的辛酸。大多数华侨一辈子只回乡几次，不等生下孩子

就走，他们可以在侨居地注册生了几个儿子，取得儿子的出生证，儿子以后凭出生证出洋。没有出生证的买别人的出生证。南隆村许多在外做工的华侨都有悲惨的遭遇，有的长期没有寄钱回家，村人传说他一直失业，最后家人不知其去向，也不知所终。30年代有个妇女嫁到本村，婚后不久丈夫去了新西兰，初期还寄点钱回来养家，以后数十年杳无音信，生死不明，妻子在家“守活寡”五六十年，直至90年代去世。大多数侨眷妇女，也是过的“守活寡”的生活，难怪她们发出了“青春守活寡，千里迢迢谁共话？”的哀怨。30年代前期，是台山华侨回乡建房的高潮，南隆村的华侨也纷纷回乡建造两层或三层的楼房，在三间两廊式传统民居的基础上，与西方建筑形式相结合，中西合璧。这也是台山华侨文化的特殊景观之一。抗战前后兵荒马乱，山区盖碉堡式楼房，抵御外侵，如今全市还留下约5000座。

解放前台山有买子之风。无子而抱养他人之子为己子的收养子风俗，在许多民族中都流行，但在台山盛行此风则与华侨长期只身出洋有关。华工极少还乡，没有儿子的，妻子在乡间买子作为子嗣，养子被编入族谱。也有的地方对养子在祭祖、继承遗产等方面予以限制。一些营利之徒拐掳他人之子辗转交易。20世纪初《新宁杂志》曾载《论新宁宜厉行买子之禁》、《针砭新宁之陋习》等文，呼吁革除买子之习。

抗日战争期间，台山侨乡和华侨家庭遭受深重的灾难。抗战初期，广州等地沦陷，有小广州之称的台山县城呈现畸形繁荣，广州大学也迁到这里办学。1941年3月和9月日军先后两次在广海登陆。从1942年初开始侨汇不通，许多侨眷失去了生活的主要来源。1943年台山发生特大饥荒，城乡出现人吃人的现象。仅端芬一个侨区当时在家人口约5万余人，饿死了8416人，卖儿鬻女的775人，外逃的2532人，行乞的2200余人。这一年台山流亡到